

永遠的「文藝鬥士」——張道藩

另眼看作家系列之十六

蔡登山 ◎ 文字工作者

談到張道藩，人們馬上會聯想到蔣碧薇、徐悲鴻、孫多慈等人。蔣碧薇（1898 - 1978）出生在江蘇宜興一個世代望族的大家庭裏，13歲那年由父親做主定下親事。但幾年後，徐悲鴻卻闖入了她的生活。其後，一心想掙脫封建思想束縛的蔣碧薇隨徐悲鴻一起私奔到日本東京，然後又同赴巴黎留學。1922年，在德國柏林他們認識了青年畫家張道藩（1897 - 1968）。徐悲鴻回國後，蔣碧薇還留在巴黎，和張道藩等經常在一起聊天、跳舞，張對蔣殷勤有加。1926年2月，張道藩在一封長信中正式表達其對蔣的愛意，蔣予以回絕。此後，張道藩和法國姑娘素珊（中文名：郭淑媛）結婚。1930年，張、蔣、徐三人又一次在國內相逢。徐悲鴻是時在南京中央大學任教，而張道藩已當上了南京市政府的主任秘書。之後徐悲鴻移情別戀愛上他的學生孫多慈，1945年，徐悲鴻登報聲明與蔣碧薇離婚，並於次年與廖靜文喜結良緣。而蔣碧薇從此成為張道藩的情婦。素珊在得知實情之後，多次要求張與蔣斷絕關係，但是張道藩卻不予理睬。1958年張、蔣關係走到了盡頭，1960年底，張道藩與妻子破鏡重圓。而在之後的時間裏，蔣碧薇把自己一生的戀情寫入了五十萬字的《蔣碧薇回憶錄》中。她與徐悲鴻的婚姻維持二十多年，與張道藩的戀情則長達四十多載，此情綿綿，但最後都以悲劇收場。

張道藩一生官銜太多，曾連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並任中央常務委員、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。在黨務方面，曾任駐倫敦支部評議長、貴州省黨務指導員、南京市黨部委員、江蘇省黨部委員、中央組織部秘書、中央組織部及中央社會部副部長、中央宣傳部及中央海外部部長、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主任；在行政方面，曾任廣東省政府農廳秘書、南京市政府秘書長、浙江省政府教育廳長、交通部次長、內政部次長、教育部次長；在教育方面，曾任國立青島大學教務長、中央政治學校教育長；在文化方面，曾創立中華全國美術會，任理事長，創立國立戲劇學校，任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，並任其他許多學術文化團體理事長及常務理事。但在他生命的最後時刻，他說：「……我若去了，不要把一些官銜刻在我的墓前，我只希望在一塊石頭上刻上『中華民國文藝鬥士張道藩』幾個字，便心滿意足了……」。是的，從抗戰勝利之後，張道藩逐漸將心力投入文藝界，來到臺灣之後，更是國民黨在文藝政策及執行方面的最高負責人。

1949年1月以後，大陸局勢逆轉，4月下旬張道藩從上海飛往廣州。後來在某次中央常會中，提議裁撤「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」（簡稱「文運會」），將原有業務歸併到中央宣傳部，

結束這個在他手中創設，已有八年多的「文運會」。12月底，中國廣播公司在臺北改組，他當選為董事長，直到1954年5月卸任，他從一個對廣播外行，到奠定堅實的基礎，張道藩功不可沒。

1950年春，他在蔣介石的指示下創設「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」（簡稱「文獎會」），獎助富有時代性的文藝創作，直到1957年7月結束。在七年多裡，獎助作家超過千人，對臺灣五〇年代文藝思潮的形成，產生巨大的影響。同年5月4日，又成立「中國文藝協會」（簡稱「文協」）。先後設置了小說、詩歌、散文、音樂、美術、話劇、電影、戲曲、攝影、舞蹈、文藝論評、民俗文藝、新聞文藝、廣播電視文藝、國外文藝工作、文藝翻譯、大陸文藝工作、文藝研究發展等18個委員會。他重視青年的文藝教育，他指出文藝最可貴者在創新，創新的希望在青年，他在〈我對文藝工作的體認和期望〉中說：「為了整個文學的前途，文藝事業必須後繼有人。……不是要青年向我們看齊，照著已有的老樣子摹寫，而是要我們看青年人自己的想法和看法是否有新穎的獨特的地方，依循他們才性之所近，來引導他們不斷進步，發展他們的創造力」。同年8月，「文協」和教育廳合辦暑期青年文藝研習會。10月，「文協」成立小組，義務為文藝青年批改習作，而他接任《中華日報》董事長，更增闢中學生週刊，約作家五十人為中學生修改作品。「青年重要。」他總是這麼說。

作家王鼎鈞特別提到青年小說家馮馮的例子，馮馮當時寫了一部自傳體小說《微曦》，長度超過100萬字，起初，他把這部小說送到《中央日報》副刊，據形容，馮馮把稿子裝在麵粉袋裡扛在肩上。《中央日報》副刊版面無法容納，勸他精簡成20萬字，馮馮當然捨不得。1964年4月，《微曦》由皇冠出版社出版。嘉新水泥公司捐款成立文化基金會，設置文藝獎金，馮馮把《微曦》送去。馮馮出身軍旅，刻苦自修，風度可親，引起董事長王雲五的關注。雲老特別請張道藩負責審查《微曦》，那時張道藩已68歲，連年抱病，仍然花了一星期時間，把這部超級長篇一個字一個字讀完，還寫了5000字的「概略」，以便思考衡量，他給《微曦》很高的評價，馮馮得到最高獎金。這一年，馮馮27歲。馮馮後來當選「十大傑出青年」。馮馮的成名，與蒙張道藩的肯定有相當大的關係。

作家王鼎鈞又說：「臺灣在五〇年代號稱恐怖時期，政府對文藝作家百般猜疑，而作家多半以對現實政治離心為高，兩者互為因果。道公實在不願意聽到某某作家被傳訊了、某某作家被拘捕了，他曾多次要求政府善待作家，委委婉婉見諸文字：『不要計較他們的小節，待之以朋友，愛之如兄弟，引導他們的趨向，發揮他們的天才，激勵他們的志氣，替國家社會多多效力。』他也非常希望作家換一個眼光看現實政治，有時見諸文字：『在文藝的世界裡，能夠解脫現實的束縛，追求理想的自由，以智慧代替權力，以和諧消融矛盾，以喜樂化除痛苦，以博大的愛心寬容偏狹的憎恨。』」

1952年3月，張道藩繼劉建群之後擔任立法院長，迄1961年2月獲准辭職為止，歷時9

年，這也是他一生當中政治生涯的最高峰。在院長任內，他盡心盡力，任勞任怨，充分發揮議長的功能，也表現了他鉅細靡遺的行政幹才。此外，他大公無私的清廉操守，更贏得全院同仁一致的讚揚。

1954年3月，吳國楨在美國提出批判政府的尖銳言論，被稱為「吳國楨事件」。其實吳國楨一直都是蔣介石的寵臣，蔣下野後，吳國楨隨蔣四處行動，作為他的幕僚，出謀劃策，並在1949年8月1日成立的中國國民黨總裁辦公室內任職，吳國楨對臺灣政治有所動作，此亦種下了陳誠對吳不滿的遠因。國民政府遷臺後，蔣為爭取美國支持與經援，任命和美國有良好關係的吳國楨出任臺灣省主席兼保安司令、行政院政務委員。然而在韓戰爆發後，美國改為全力支持國民政府並給予美援，吳國楨的地位也因此下降，與蔣經國和彭孟緝的特務系統也不斷發生衝突。1950年，臺灣火柴公司總經理王哲甫無辜被捕，吳下令放人。臺灣保安副司令彭孟緝執行蔣經國命令，堅不放人，先判死刑；由於吳的反對，經蔣介石出面，改判7年徒刑。吳國楨已完全無法再與蔣經國共事，蔣中正曾派黃伯度傳話，許以行政院長之職，要吳好好與蔣經國合作，願當院長兼省主席亦可。但吳一概拒絕，他偕妻上日月潭，聲言非准予辭職不下山。後來在下山時，吳的座車前輪與主軸聯接的地方，疑似螺絲鬆動，是經人動過手腳，吳國楨幾遭不測。1953年4月，吳國楨辭省主席職，同年5月24日，吳與妻子前往美國。

1954年1月，臺灣傳出吳國楨貪污套取巨額外匯的傳聞，臺灣報紙刊出〈勸吳國楨從速回臺灣〉社論。同年2月9日，吳國楨在臺灣大各報刊登啓事駁斥謠言：「此次來美，曾經由行政院長陳院長批准，以私人所有臺幣向臺灣銀行購買美金五千元，作為旅費，此外未由政府或政府中之任何人員批准撥給分文公款，……為國服務三十餘年，平生自愛，未曾貪污，在此國難當頭之際，若尚存心混水摸魚盜取公帑，實際自覺不擠於人類。」並且公開批評國民黨當局，批評救國團、情治單位及蔣介石獨裁，並指出臺灣當時政治的六大問題：一黨專政、軍隊政戰部門、特務問題、人權問題、言論自由與思想控制。美國《紐約時報》、《芝加哥論壇報》、《時代》、《新聞周刊》等著名報刊，無不爭相報導。

與吳國楨同是南開中學的立法院長張道藩，不顧「同窗之誼」，曾3度向行政院提出三次質詢批評吳國楨，罪名包括「擅離職守，拒辦移交，私自濫發鈔票，拋空糧食；並在外匯、貿易、林產等問題的處理上，非法亂紀，專擅操縱，有意地包庇貪污、營私舞弊等」，列舉吳國楨13條罪狀；但證據明顯不足，僅用「據說」、「據聞」、「據報」等不確定的字眼。陶希聖則發表〈兩把刀、殺到底〉一文，口誅筆伐。吳國楨寫了3封信給蔣介石，逐條駁斥對他的誣蔑。不久吳國楨在美刊出〈上總統書〉，批評蔣介石「自私之心較愛國之心為重，且又故步自封，不予任何人以批評建議之機會。」同時，把矛頭直指「太子」蔣經國，主張將其送入「美國大學或研究院讀書」，否則會妨礙臺灣進步。3月17日，國民大會更通過決議，要求政府除

撤免吳國楨政務委員職務並依法究辦，蔣介石同日並正式發表「總統命令」：「據行政院呈：『本院政務委員吳國楨於去年 5 月借病請假赴美，託故不歸，自本年 2 月以來，竟連續散佈荒誕謠言，多方詆毀政府，企圖淆亂國際視聽，破壞反共復國大計，擬請予撤職處分。另據各方報告，該員前在臺灣省主席任內，多有違法和瀆職之處，自應一並依法查明究辦，請鑒核明令示遵』等情。查該吳國楨歷任政府高級官吏，負重要責職二十餘年，乃出國甫及數月，即背叛國家污蔑政府，妄圖分化國軍，離間人民與政府及僑胞與祖國之關係，居心叵測，罪跡顯著，應即將所任行政院政務委員一職予以撤免，以振綱紀，至所報該吳國楨前在臺灣省政府主席任內違法與瀆職情事，並應依法徹底查究辦，此令。」將吳國楨撤職查辦，並開除吳國楨的國民黨籍。

由於在立法院的精神負擔太重，已嚴重影響張道藩的健康，因此他興起辭去立法院長一職，他說：「我這麼做，既不是矯情，更不是姿態，而是出自真心。因為這個工作，無論和我的性情或是我的志趣，都背道而馳。我最初坐在主席臺上，還能讓自己試作客串的演員或是欣賞的觀眾。但政治是要負責任的，位置坐的愈高，責任負的愈重。我的責任心又很強，不能做到『笑罵由人笑罵，院長我自爲之。』」但蔣介石不讓他辭職，張道藩休息了短暫時間後，只好硬著頭皮，抑制自己的心情，繼續從事沈重的工作。

1956 年 7 月，在他 60 歲生日過後不久，他呈請中央結束文獎會業務，停辦出版 5 年的《文藝創作》月刊，並在原址創辦中興文藝圖書館，自兼館長。辦圖書館是他多年來的心願，他把當年在上海、南京、重慶各地出版的文藝書籍，包括左翼作家的作品，約在萬冊左右，整理出來，以滿足愛好文藝的青年的迫切需要。這也成了當時臺灣收藏二、三〇年代文藝作品最多的圖書館之一。

國際筆會 1922 年於倫敦成立，中國於 1925 年加入，總會設在上海，會長由蔡元培擔任，林語堂任執行秘書。但除了 1933 年 2 月 17 日下午以「國際筆會中國分會」的名義，招待過蕭伯納訪華外，該會甚少活動，形同虛設。1957 年，國際筆會準備在東京召開第 29 屆大會，經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代表陳源提議，臺灣重建了筆會組織，推舉張道藩爲會長，並於同年恢復了會籍。1959 年，陳源與羅家倫（繼任會長）、陳紀澄、曾恩波出席了在德國法蘭克福召開的第 30 屆國際筆會。

研究者秦賢次認爲張道藩對文藝界影響最大的是他的文藝政策觀，他說：「由於他一生在高層黨政界的一帆風順，由於他是國民黨高官中對文藝及文藝工作者最爲關愛者，更由於他是國民黨多年來最高的文藝主管。因此他的文藝政策觀逐漸匯聚形成政府當局的文藝政策，從而對文藝界產生巨大的影響。」它具體而微地顯現在 1967 年 11 月國民黨第 9 屆五中全會所通過的「當前文藝政策」上。秦賢次認爲這是民國以來我國文藝政策的新里程碑。除了確定文藝的基

本目標及創作路線外，更重要的是政府要設立專責的文藝機構作為輔導；政府更要設置鉅額文藝基金，列入預算，作為培養人才，獎勵作品之經費等等。這個具有前瞻性的文藝政策，事實上係透過張道藩的苦心策劃，經大會修正通過的。最重要的是，這個文藝政策並不是開過會後就束之高閣存檔了事，後來的發展正顯示它的正確性與可行性。

張道藩說：「我生平為了文藝，在極困難的時候，只好自己站出來打前鋒。俗語說：『出頭的椽子先爛』，這當然是一種犧牲。但做革命的文藝工作，總要有人肯犧牲。——即使入地獄，只要能對國家民族有利，我也要把地獄看成天堂。」這是張道藩對畢生貢獻心力的文藝工作，至死不悔的精神寫照。

1968年6月2日，他走完人生最後一程，享年72歲。

華仲慶教授這麼評價他：「他在公私情理之間，隨時含有兩種極端矛盾，以致痛苦終身。因為他對社會有極端的熱愛，而又有極端的厭惡；他智慧崇高，頭腦冷靜，能分析觀察事理，同時感情熱熾，天天在自煎自熬；他不肯同化，又無法改造，有心解脫，又不忍割捨；別人所陶醉的高位，他認為無聊，別人所滿足的盛名，他覺得可恥；在不斷追求、不斷希望、不斷搏鬥、又不斷矛盾中，可能會歸於幻滅，而形成這位藝術政治家畢生的悲劇。」

張道藩曾經說：「我徹底反省，生平雖於公德無虧，卻受私情所累。」確實對於美麗、善良、賢淑的元配郭淑媛而言，張道藩是有所虧欠的。自從1949年年底，郭淑媛女士就帶著女兒和小姑到雪梨去，生活艱苦到要靠她十指做手工賺錢來教養兩個女孩。直到1959年，張道藩才在不斷地自責之下，說：「我自己越想越難受，身為立法院長，讓太太在海外長期受苦，我簡直不配做個堂堂的男子漢！」他終於湊足一筆旅費到澳洲探視妻女幼妹，夫妻此時已闊別9年，但只歡聚兩個月，張道藩因公務在身就回來了。次年妻女返臺定居，一家總算團圓。

1981年，張道藩逝世十多年後，因道藩圖書館交由臺北市政府接辦，郭淑媛從美返國，她除了希望道藩先生的精神因這個圖書館而得以流傳之外，她也談道：「張先生留給我的，除了數不盡的愛和回憶，最重要的是『愛國』兩個字。」當年張道藩人在臺北，但他心裡卻惦念著遠在澳洲生活的郭淑媛，她在接受記者訪問說：「他親手從臺灣寄龍井茶給我，郵包上有他的親筆字。」她說著說著，眼睛漲滿了淚水。